九州大学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Kyushu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东亚同时代史视野下的中日文学

赵，京华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https://hdl.handle.net/2324/1913919

出版情報：「『春水』手稿と日中の文学交流 ： 周作人、冰心、濱一衛」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論文集. 2, pp.15-20, 2018-02-06. 九州大学QR プログラム「人社系アジア研究活性化重点支援」「新資料発見に伴う東アジア文化研究の多角的展開、および国際研究拠点の構築」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

KYUSHU UNIVERSITY

东亚同时代史视野下的中日文学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赵 京 华

一　引言

2016 年，中里见敬教授在日本九州大学图书馆“滨文库”找到冰心的《春水》手稿，这的确是近年来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和中日文学关系研究领域重要的文献史料发现。据中里见教授的介绍，此次手稿的发现其契机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于 2016 年第 11 期发表的《周作人日记》（1939 年部分）。而我作为《丛刊》的编委之一，有幸通过潘世圣教授的介绍第一时间拜读到中里见教授的论文《冰心手稿藏身日本九州大学——《春水》手稿、周作人、滨一卫》，并将该论文推荐给编辑部发表（见 2017 年第 6 期）。

我最初看到手稿的照片是在中里见教授的文章中，那时的感觉真宛若一湾“春水”流过心田一般！就是说，冰心手抄的原稿其字迹的清秀典雅，完全可视为书法的精品而供我们后人鉴赏。同时，如中里见教授论文所记，那应该是冰心在燕京大学国文系的老师周作人决定将《春水》列入自己主编的新潮文艺丛书之中出版，而冰心为此特意抄录的。这是发生在一个世纪前的 1922 年底的事情，毫无疑问此乃该部经典作品的最原始手稿。也因此，它同时具有了文学史上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有关这一点，包括冰心《春水》与周作人的关系以及周作人一家与滨一卫的交往过程，中里见教授的论文已经做了充分的研究和阐发。作为周作人研究者和关心中日近现代文学和文化关系史的学者，我将在本文中沿着中里见教授的研究成果，对《春水》手稿的文献史料价值再做一些发挥。同时，重点就如何从东亚同时代史的大视野出发来理解 150 年来中日两国文学的复杂关系，提出自己的思考。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此次《春水》手稿在九州大学被发现的深远意义。

二　《春水》手稿的文献史料价值

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讲，我认为《春水》手稿的文献史料价值至少可以分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作为《春水》最原始的手抄稿，为我们提供了比较及校勘不同版本的样板和基准。冰心的《春水》最初连载于 1922 年 3 月 31 日到 6 月 30 日的《晨报副镌》，而据中里见教授的介绍，这次发现的手稿首页诗集名“春水”左端，有“新潮社文艺丛书”字样。故可以确定这是为了刊行诗集单行本所抄录的定稿。而当时的周作人为北京大学新潮文艺丛书的主编，

《春水》则是他编辑的该套丛书的第一部，1923 年 5 月由新潮社出版。因此，诗集出版后这部手稿也就留在了他的手里，成为一个欣慰的纪念。那么，作为作者亲手抄定的诗集手稿，它也就有了原始标本的意义。就是说，刊发在报纸副刊的诗作和出版社发行的单行本之间存在着这个手稿，它足以成为后来出版的诗集各种版本的一个校勘标准，至少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参照。我们知道，根据学术界通常的做法，在编辑作品的单行本或者选本乃至全集的时候，一般可以根据作家的初稿，也可以参照最初刊发的报刊杂志来汇校。而作家本人的手抄稿，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依据。

例如，将手稿与中国最新出版的一部《冰心诗文选》（刘东方主编，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2016）比较的话，就会发现《春水》的“自序”其形式并不一样，手稿的诗行排列错落不一，显示了作者对诗歌形式的重视。而《诗文选》则一律顶格排列，第 182 节诗手稿和《诗文选》，虽都是错落不一排列的，但还有微小的差异。此外，手稿和《诗文选》在标点符号上的不同，则是最大的问题。诗歌的标点符号，作为冰心所注重的诗歌形式的一部分，自然十分重要。我们今天除了根据现行汉语标点符号的要求，作出必要的最小限度的改动外，还是要尽可能保存其原初的形态。当然，在没发现手稿之前，我们只能根据最初发表在《晨报副镌》的形态，或者新潮文艺出版社的单行本来判定。如今，手稿则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校勘基准。

第二，这次手稿的发现，为我们提示了周作人与冰心关系研究的进一步线索。现代文学史上有一种传言，说周作人有四大弟子。但到底是哪四人说法不一，俞平伯、废名、沈启无是明确的，至于最后一位是冰心还是江绍原，好像颇有出入。然而，不管冰心是否包括在“四大弟子”之中，总之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初期，文学大家周作人作为燕京大学国文系的教师，曾给予学生冰心的诗歌和小说创作以悉心的指导而成为其文学的引路人，则是毫无疑问的。对于文学史上这一段佳话，中里见教授的论文也有深入的讨论。而我以这次手稿的发现为契机，进一步查阅了周作人 1922 年至 1923 年的《日记》（大象出版社，1996），结果确认了许多新的事实。例如，周作人多次参加新潮文艺社聚会的记录与冰心《春水》列入丛书的关联，还有在冰心即将留学美国的前后周作人收到《春水》样书以及两人通信的记录，等等。

第三，《春水》手稿被赠与日本学者滨一卫并在 80 年之后被发现，这再次凸显了周作人与日本关系的深厚复杂。作为中国现代最大的知日派作家，周作人与日本及其文化、与日本文人学者的关系之广泛深入，乃是众所周知的。而在战火纷飞的 1939 年，他把冰心的《春水》手稿赠给晚辈的滨一卫，其行为的意涵和动机究竟为何？中里见教授的文论后半部分对此已有初步的探讨。而我，联想到近年来周家发现的周作人与日本大正时期以来的文人作家上千封的往来信函，还有已经整理出来并公开发表的周作人与松枝茂夫、与安藤更生的大量书信等等，更深切感受到“周作人与日本关系”乃至“中日近现代文学和文化关系”这个议题的重要。我们以往只是大概了解这种关系的复杂密切，但现在看来，所知道的还远远不够。我们甚至需要改变以往只是在一国历史架构下或一般比较文学之影响比较研究的结构中观察问题的思考习

惯，从作为历史事实和“思想连锁”之场域的“东亚同时代史”角度出发，来观察交织着密切合作、彼此影响甚至激烈对抗的中日近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关系史。

三　以东亚同时代史为视野深化中日文学关系的理解

所谓“东亚同时代史”，是指超越一国历史或两国关系史叙述的、以世界特别是区域为单位思考问题的方法论视野。1870 年代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孤立于这个全球网络化的世界而独立发展，必须在相互竞争彼此关联甚至征服与被征服的结构关系中谋求自立与发展。而由革命和战争构成的 20 世纪，则更使人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的情形是这样，东亚区域的近现代史也是如此。自西方殖民主义敲开亚洲的大门，东亚地区原有的汉字儒教圈这样一种以文化和信仰为根基的共同体便告解体，而被以国际法为基准的国家间相互承认的条约关系所取代。以东亚的中日韩三国为例，近代化的起始和社会转型的模式虽有不同，但自 19 世纪后期随着过去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的崩溃和现代国家关系的出现，三国便开始在紧密关联甚至激烈对抗的结构中发展而来，从而形成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互为存在条件的关系结构，我所谓“东亚同时代史”就是指这样一种新的关系结构。这个关系结构作为一个历史事实早就存在，但受制于虚幻的“国史”——一国历史之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国家叙述，我们并没有对这种已然存在的事实予以充分的认识。

我近些年来一直在关注中日近现代关系史的研究。渐渐地，形成了一个比较清晰的总体目标，这就是努力构筑中日间的“东亚同时代史”。当然，由于专业和学养的关系，主要还是局限于两国近代以来的思想史包括文化学术和文学艺术方面的关联。这期间，给予我思考灵感和方法论上重要启发的有两位日本学者。一位是始终不渝地以日本人的观感在广阔的亚洲现代史语境下通过文学来观察中国革命的木山英雄，另一位是同样从日本的位置出发在庞大的文献考证和史料分析基础上提出观察亚洲之“思想连锁”方法的山室信一。

木山英雄著有《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岩波书店，2005）一书，序言中作者表示要通过旧体诗的研究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同时代史意义。木山英雄认为，“毛泽东的革命深深植根于亚洲的历史与现实之中”，自己身为日本人虽然不在这个“革命”的洪流中，但对作为“亚洲在上世纪经历了怎样的经验”的问题，还是有仿佛感同身受的体会。我在阅读和后来翻译此书的过程中，则渐渐对于“亚洲”或者缩小范围为“东亚同时代史”的观念意象，有了比较清晰的印象。就是说，20 世纪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帝国主义征服战争与被压迫民族的反抗与社会革命，导致东亚各民族国家在不曾有过的程度上紧密捆绑在一起，成为矛盾抗争乃至休戚与共的利益攸关方。这段历史，也就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缺少任何一方都无法叙述的历史。我们不能只在一国的内部谈论中国或日本的近现代史，更不能因战争导致的仇恨而忽视中日乃至东亚区域彼此纠缠在一起的种种复杂

关联。在思考 20 世纪中日关系问题时，我们同样需要这样一种“同时代史”的感受方式和关怀视角。

另一位的山室信一，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他长期致力于以日本为原点来考察近代“亚洲”空间意识和同一性归属感在该区域内的形成与扩散，试图建立起一个有关亚洲叙述的思想史阐释架构。他的《作为思想课题的亚洲——基轴、连锁、投企》（岩波书店，2001），就是其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正如该书序章所强调的：在 20 世纪，日本既是创造出“亚洲”的动因，同时在给予亚洲以巨大冲击的同时又曾被亚洲所拒绝，日本与亚洲乃至世界是怎样连接在一起的，这是作者要探讨的的基本课题。与木山英雄以中国文学为主要研究对象不同，山室信一的专业为日本政治思想史，然而他们在拥有日本立场的同时又自觉到“亚洲”的存在，尤其关注这一区域空间之于我们的思想史意义，在这方面则又是一样的。这恐怕是日本特殊的近代境况(创造了“亚洲”同时又被亚洲所拒绝)，才造就了日本学者这样特别的思想敏感和知识背景。

山室信一的著作，其贡献除了大量丰富的有关“亚洲”叙述之思想史个案考察和实证分析外，就在于他所提出的三个概念或方法论视角：基轴、连锁、投企（project）。第一个“思想基轴”，是认识和感受作为一个整体之亚洲区域空间的基本概念。作者在书中选取了文明、人种和文化、民族这样两对儿词汇，作为认识亚洲的基轴，由此来把握日本人如何认识亚洲并在此找到自身位置的。第二个“思想连锁”，讨论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相伴而生的知识和制度怎样在亚洲间循环往复的移动，由此形成了有关区域社会的同一与差异的意识。第三个“思想投企”，作为改变现状而投向未来的言行，主要是用以讨论日本独创的思想和国家战略——亚洲主义的实践过程。

这里，使我最受启发的是“思想连锁”。它既可以指示某种状态——亚洲区域内的近代思想原本是彼此联通而相互间构成网络状态的，更意味着思想史研究的一种方法——有意识地去连接被某一民族的“国史”所遮蔽了的各种思想，包括未能发挥连锁功能的那些“失掉的环节”。以“思想连锁”的方式看待问题，一种全新的亚洲区域史同时也是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史——东亚同时代史，就可以强有力地呈现出来。它超越以往常见的一民族的国史叙述，展现出一个广阔的区域动态历史的新天地。而我，通过接触山室信一的著作，那个来自木山英雄的有关“东亚同时代史”的观念意象，也渐渐有了清晰的轮廓和可操作的方法论途径。近些年来，我穿梭于中日两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学场域中间，正是要寻找一个个“思想连锁”的环节链以及“失掉的环节”。就是说，上述那样一种东亚同时代史的关系结构，也适用于研究中日近现代文学和文化的关系，它可以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两国文学原本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状态。

如前所述，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化和帝国主义对全球的殖民征服，19 世纪中叶以来的亚洲作为世界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已经形成了与此前汉字儒教圈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全方位交叉互动的区域空间。其中各民族国家间的“思想连锁”和文化交涉，早已是双向互通彼此冲击、

对抗乃至融合的一种形态。我注意到，山室信一称“日本的冲击”对于亚洲的影响远比“西方的冲击”来得强烈，但这应该只是针对二战以前的情况而言的。实际上，1920 年代之后的中国大革命乃至 1949 年成功建国的历史过程，其中从孙中山、鲁迅到毛泽东的民族革命和社会改造的思想与实践，也强烈地“冲击”了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而作为思想相互连锁文化彼此交涉的典型个案，是中国现代作家鲁迅。他早年从日本留学中获得大量近代知识和思想，在后来参与革命及其文学写作中形成了代表中国革命总体特征的反抗精神和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品格。而死后，他作为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英雄又反过来强烈影响了战后的日本、韩国。

这使我改变了以往只关注日本文学如何影响中国作家和文学运动，这样一种比较文学研究中影响比较的简单方法，开始形成了以东亚同时代史为视角，观察彼此关联相互影响的中日近现代文学关系的新方法和新视角。

四　结语

九州大学此次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以“东亚的交流与文学”为总议题。我理解，就是要通过冰心《春水》手稿的发现，来重新思考中日两国乃至东亚的近代文学交流史。如前所述，在战火纷飞的 1939 年，周作人把冰心的《春水》手稿赠给晚辈的日本学者滨一卫，其行为的意涵和动机究竟为何？周作人一家与滨一卫先生长达半个世纪的友情，还有滨文库有关中国文艺资料的丰富收藏等等，中里见教授在文论的后半部分，都有初步的探讨。我想，如果进一步从“东亚同时代史”的视角出发，来理解周作人与日本的关系乃至整个中日近现代文学交流的历史，一定会有新的发现。也将会进一步理解，周作人周丰一父子与滨一卫之间跨越战争和国家藩篱而实现的民间个人的与文学思想的交流之深远意义。

其实，周作人与日本的关系也只是中日近现代文学交流史上的一个例子而已。鲁迅与明治日本、创造社与大正时代的文学、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中日左翼文学并肩作战彼此互动的历史，还有战争期间中日两国文人学者多形态的复杂交往，以及二战以后中国革命及鲁迅在日本和东亚的广泛传播……。这些历史现象，有的是已知的，有的则是未知的或者暂时“失掉的环节”，如果我们能够开拓视野，从“东亚同时代史”观察过去，一个丰富复杂彼此缠绕在一起的中日两国文学文化交流的历史新面向，就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那些暂时“失掉的环节”也会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以丰富我们的历史想象。

总之，从“东亚同时代史”视野观察《春水》手稿的发现其丰富的历史意义，我更加坚信中日两国民间的、个人的乃至文学文化上之交往的重要性。不管国家间的关系如何发展变化甚至出现危机，只要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彼此交流不被中断，国家间的关系修复就有希望。我还注意到，前不久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访华，邀请中国国家主席访问日本。而舆论普遍认为，2018 年将是中日关系进一步回暖升温的年份。我们乐见中国和日本国家关系的发展，

更期待两国的民间交往不断得到深化。而民间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如鲁迅先生所言，“用文艺来沟通”乃是最平正的道路。我祝愿，冰心《春水》手稿的发现和本次学术研讨会的成功召开，将进一步促进中日两国民间交往和文学交流的深化。

2018 年 01 月 11 日

于北京